

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

四书五经

礼 记

一



中華書局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胡平生 张萌◎译注

礼记 一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书五经: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/郭丹等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1

ISBN 978-7-101-13636-4

I.四… II.郭… III.①四书-注释②四书-译文③五经-注释④五经-译文 IV.①B222.1②Z1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7278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四书五经(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)(全二十一册) |
| 译 注 者 | 郭 丹 程小青 李彬源 方 勇 王世舜 王翠叶
胡平生 张 萌 杨天才 王秀梅 陈晓芬 徐儒宗 |
| 责任编辑 | 刘胜利 宋凤娣 刘树林 周 旻 张彩梅 王守青
舒 琴 胡香玉 熊瑞敏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张 407½ 插页 42 字数 34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6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3636-4 |
| 定 价 | 660.00 元 |
-

前言

西汉初期是礼学由衰落到兴盛发达的时期。秦末起义，暴秦瓦解，天下嚣嚣，礼崩乐坏。刘邦进据关中，战胜项羽，即皇帝位，群臣在宫中饮酒争功，喧嚣呼叫，拔剑击柱，弄得汉高祖十分恼火。博士叔孙通便征聘鲁地儒生数十百人，制礼作乐演习。长乐宫建成举行典礼，叔孙通布置酒宴，廷中列车骑步卒，设旗帜，殿下安排郎中夹陛，武将在西，文臣在东，殿上侍从皆匍匐俯首，群臣依尊卑次序敬酒，莫不肃敬，“竟朝置酒，无敢讙哗失礼者”。于是，汉高祖说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重赏叔孙通，并将他从鲁地招来的弟子都安排做了郎。可知汉初是十分重视礼仪的制定与执行的，礼书的纂辑应当与这个大气候、大背景有关联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，与传习《士礼》的鲁高堂生同时治《礼》的还有鲁地的徐生，擅长礼容、礼仪。汉文帝时，徐生做了礼官大夫，后来传给了他的孙子，还有他的弟子，都做了礼官大夫，另一个治《礼》的学生萧奋做了淮阳太守。萧奋的学生孟卿，传给了后仓，后仓传给了闻人通汉、戴德、戴圣、庆普。戴德号大戴，戴圣号小戴，做过博士；庆普做过东平太傅。这几位都是当时著名的礼学家，三家都立为礼学博士，都有学生传承其学。所谓《礼记》，就是关于“礼经”的“记”，即对“经”的诠释讲解，就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。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小戴礼记》就是这类的书。下面，我们分四个

部分着重对《小戴礼记》的基本情况加以介绍和说明。

一 《礼记》的作者与编者

传世的《礼记》，有《大戴礼记》和《小戴礼记》之分。《大戴礼记》，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；《小戴礼记》，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。戴圣为戴德之从兄子。《小戴礼记》，也称为《礼记》，凡四十九篇，是一部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。《礼记》的作者，历来莫衷一是。较早提出具体作者的，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故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自孔氏。”认为《礼记》传自孔子。不过，司马迁这里所说的《礼记》是广义的，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包括《仪礼》等先秦古礼在内的许多的礼论作品，并非今本《礼记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礼类十三家，有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”，班固自注：“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”明显地不能具体指出作者，只能以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来概括陈述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认为，《礼记》本是孔子门徒共撰所闻的著作，后世通儒又各自斟酌损益以续学，陆氏并指出《中庸》是子思伋所作，《缁衣》是公孙尼子所撰，又引郑玄说《月令》乃吕不韦所撰，引卢植说《王制》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为；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结合《孔子世家》之说，看法与陆氏同。后世也不乏讨论《礼记》作者的论述，但除了少数单篇作者或可具体落实之外，大多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。

《礼记》非出于一人之手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是由后人汇辑编纂成书的。今本《礼记》的编纂者，郑玄以来都认为是西汉戴圣所编。郑玄《六艺论》说：“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，则《大戴礼》是也；戴圣传《礼》四十九篇，则此《礼记》是也。”大戴、小戴是叔侄关系，戴圣是戴德从兄之子。戴圣，字次君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

德号大戴，为信都太傅；圣号小戴，以博士论石渠，至九江太守。由是《礼》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氏之学。

石渠,即石渠阁,也就是汉代的国家图书馆,兼具收藏珍本秘籍与举办学术会议的功能。汉宣帝甘露三年(前51),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,召集儒生若干人齐聚石渠阁,讲论五经异同,戴圣也在其列。戴圣在宣帝时立为博士,后来官至九江太守。他的著作,除了编纂《礼记》四十九篇之外,还有《石渠礼论》、《群经疑义》等著作。

近世有学者对于传统《礼记》编纂者的说法提出质疑,其中较具影响力的,应属洪业先生于1936年所撰的《礼记引得序》,他认为《礼记》不是由戴圣编纂,其编纂时间应在大小戴之后、郑玄之前,而且可能不是一人所辑、一时所成。他的一条理由是,戴圣是今文《礼》学家,而《礼记》中则有不少古文《礼》的内容,因此《小戴礼》不可能是戴圣所编纂。实际上,汉代当时的今古文之争,并不像后来,特别是清人所说的那么形同水火、势不两立。大戴、小戴编纂《礼记》时混用今文、古文,并不奇怪。洪业先生的意见并不能成立。

二 《礼记》的来源与成书

由于《礼记》各篇来源各不相同,所以在谈《礼记》的成书经过之前,必须对全书四十九篇的来源略作梳理。

关于四十九篇的来源问题,历来有些争辩。王锴先生《礼记成书考》汇集各家见解,最后提出:《礼记》四十九篇,应是选辑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的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”、《明堂阴阳记》等几种著作,以及《艺文志》记载的《曾子》、《子思子》等已亡佚的儒家文献;而这些“礼记”所议论的内容,则是今本《仪礼》十七篇以及散见其他古书或早已亡佚的古礼。

有关《礼记》的成书经过,历来论说甚多。台湾学者周何先生《礼学概论》列出四个发展阶段,分别为附经而作、单独成篇、选编成书、定本流传四个阶段。我们结合出土文献来看,前两个阶段是否必然,因为先秦时代的记文,一般是单独成篇的,所谓附经而作的材料不是很确凿。

所以,我们姑且将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,并根据出土文献典籍加以补充说明。

(一)附经而作与单独成篇

早期《礼记》附经而作,可以从今本《仪礼》看到证据。今本《仪礼》十七篇,除了《士相见》、《大射》、《少牢馈食》、《有司彻》等四篇,其他十一篇,如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等,篇末都标有一“记”字。“记”后面的内容,或接续书写对经文的发明,或记礼节之变异,或记传闻,这可能是当时学者读礼经时,在每卷经文后面的空白竹简随手附记说明或感想,这些记文便是早期附经而作的痕迹。

单独成篇的形态,先秦时也已经出现。以今本《缁衣》为例,属于战国时期的郭店楚墓竹简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各有一篇,内容大同小异;又如《孔子闲居》篇,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(题为《民之父母》);这都是最好的明证。

汉初所见的《礼记》,也可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。据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,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,从四方民间搜集不少古书:

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,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,皆经传说记,七十子之徒所论。

颜师古注:“《礼》者,礼经也;《礼记》者,诸儒记礼之说也。”此处《礼记》与《礼》并列,可见学者已有意将“礼记”别为一类。

又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说文解字·叙》,汉武帝末年,鲁恭王坏孔壁而得古文典籍数十篇,其中就有《礼记》。据此,李学勤《郭店简与〈礼记〉》认为:“《汉志》的‘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’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来源。”至于这两种“礼记”流传形式,李学勤认为由于先秦简帛流传不易,书籍多以单篇行世,所以不管是河间献王得书或孔壁中书,必有许多书的单篇;也就是说,上述所谓的“礼记”未必指书籍,可能只是一种通称,犹如“史记”一词本泛指各国之史书,至司马迁《太史公书》出,才作为书名的专称。

这些先秦以至汉初的“礼记”与戴圣所编纂《礼记》的关系，吴承仕《经典释文叙录疏证》认为，后者（戴圣编《礼记》）犹如“晚出之丛书”，而前者（各种《礼记》来源）则如“稍古之丛书”，这可以算是一个贴切的比喻。

（二）选编成书

汉宣帝时期，戴圣与其叔戴德都在学官讲授《礼》。我们从今天的十七篇《仪礼》可知，各篇备载种种仪节，虽形式十分具体，但这种行礼如仪的节目单，难免枯燥乏味。而传世的“礼记”，累积了历来许多儒家学者的精彩阐释，将各种仪节赋予精神与意义，可让平淡无奇的礼单变得生动，深化礼义，因此二戴从中选编出适用的礼学参考资料，而成大、小戴《礼记》，作为讲学的辅助材料。

（三）定本流传

戴圣虽然编纂了《礼记》一书，但为了配合讲学需要，篇目未必始终相同；这与今天编选“古文文选”相仿，书名可以一样，但选录的篇目可能因为爱好或需求的变化而有所变更，因而初版与再版的篇目未必相同。到了东汉，知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三《礼》作注，据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引晋人陈邵《周礼论序》云“马融、卢植考诸家同异，附戴圣篇章，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”，郑玄所依据的正是马、卢的本子。经过名重士林的经学大师郑玄作注，使《礼记》的可读性更加提高，于是才有定本《礼记》流传至今。

三 《礼记》的内容与分类

今本《礼记》共四十九篇，以《曲礼》为始，以《丧服四制》为终。其中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、《杂记》三篇又分上、下，因此实际上只有四十六篇。依今本《礼记》篇次，略述各篇内容要旨如下：

1.《曲礼》上下：略记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仪文，兼及日常洒扫应对进退之法。

- 2.《檀弓》上下:杂记各种行礼故事,尤以丧礼为多数。
- 3.《王制》:记述君王应有的行政制度,其中部分有历史依据,部分则是理想之言。
- 4.《月令》:按十二个月次,记录各月天象特征,并说明政令、祭祀、行礼等事宜。
- 5.《曾子问》:以孔子与曾子问答方式,记录丧礼中的特殊事例,也兼及冠、昏等吉礼。
- 6.《文王世子》:记世子的教育问题,以及相关教育制度等。
- 7.《礼运》:主要叙述礼义、礼制的源流与运行。
- 8.《礼器》:阐述礼能使人成器之义,成器指成德器之美或用器之制。
- 9.《郊特牲》:杂记各礼,发挥礼义,其中又以祭祀较多。
- 10.《内则》:记家庭内各种人际关系的日常生活准则。
- 11.《玉藻》:记天子诸侯的饮食衣饰居处之法,以及其配偶的服制等。
- 12.《明堂位》:记鲁国国君因周公之德而可袭用古代天子衣服、器物之事。
- 13.《丧服小记》:主要记丧礼中特殊的服饰要求。
- 14.《大传》:记服制、宗法、祭法等制度。
- 15.《少仪》:记各种应对仪节,与《曲礼》相近。
- 16.《学记》:记古代学校教人、传道、授受的顺序以及教育得失与兴废之故。
- 17.《乐记》:主要阐述乐的形成与功能,并论述礼、乐的关系及影响等。
- 18.《杂记》上下:以杂记丧礼细节为主。
- 19.《丧大记》:记国君、大夫、士之丧制,器物方面的介绍尤其详细。
- 20.《祭法》:记载有虞氏至周朝制定祭祀天地众神的法度。

21.《祭义》：记祭祀主敬之义，同时述及孝悌祭先之道、养老尊长之义，可与《祭法》互相发明。

22.《祭统》：从不同方面论祭祀的意义。

23.《经解》：讲六经的教化功能，兼及天子德配天地、霸王治民之器、治国隆礼之道。

24.《哀公问》：记鲁哀公向孔子问礼、问政，旨在解说为政先礼、礼为政教之本的精神。

25.《仲尼燕居》：借孔子与弟子问答，说明礼的本质、内容、作用、意义。

26.《孔子闲居》：借孔子与子夏问答，阐述如何修身行事才能成为民之父母。

27.《坊记》：记如何透过礼的消极节制作用防禁各种过失。

28.《中庸》：主要阐述中庸之道。

29.《表記》：记君子如何处世为人以作为人民表率。

30.《缁衣》：多记君臣上下关系、君化民之道，兼及君子交友之道与言行准则等。

31.《奔丧》：主要记士身在异国他乡而返乡奔丧之礼，兼及天子与诸侯。前人指出本篇应属礼经，而非礼记的性质。

32.《问丧》：阐述丧礼某些仪节的意义，如始死、殓尸、安魂之祭、寝苦枕块、束发、拄杖等，并说明丧礼之制乃本于人情等。

33.《服问》：记丧服有关问题。

34.《间传》：记居丧时由于亲疏不同而表现的各种行止。

35.《三年问》：记父母丧所以三年之义，兼阐述服丧期限何以长短不同之理。

36.《深衣》：记深衣制度及意义。

37.《投壶》：专记投壶之礼。本篇也应属礼经，而非记文。

38.《儒行》：记儒者德行的特征。

39.《大学》：记博学而可以为政治国之义。

40.《冠义》：记《仪礼·士冠礼》之义。

41.《昏义》：记《仪礼·士昏礼》之义。

42.《乡饮酒义》：记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之义。

43.《射义》：记《仪礼》之《乡射礼》与《大射仪》。

44.《燕义》：记《仪礼·燕礼》之义。

45.《聘义》：记《仪礼·聘礼》之义。

46.《丧服四制》：阐述制定丧服所根据的四种原则——恩（恩情）、理（义理）、节（节制）、权（权变），分别本之于仁、义、礼、智。

由上述各篇主旨可知，全书都是与礼直接、间接相关的内容，范围十分广泛，如果要将这些篇章分分类，作一归纳，是颇为棘手的问题。最早为《礼记》篇章进行分类者，是刘向的《别录》（参孔疏引郑玄《礼记目录》所录），刘向将《礼记》四十九篇分为十一类：

（一）通论：《檀弓》上下、《礼运》、《玉藻》、《大传》、《学记》、《经解》、《哀公问》、《仲尼燕居》、《孔子闲居》、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大学》，共十六篇。

（二）制度：《曲礼》上下、《王制》、《礼器》、《少仪》、《深衣》，共六篇。

（三）丧服：《曾子问》、《丧服小记》、《杂记》上下、《丧大记》、《奔丧》、《问丧》、《服问》、《间传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丧服四制》，共十一篇。

（四）祭祀：《郊特牲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祭义》、《祭统》，共四篇。

（五）吉事：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、《射义》，共六篇。

（六）吉礼：《投壶》，一篇。

（七）明堂阴阳：《明堂位》，一篇。

（八）明堂阴阳记：《月令》，一篇。

（九）世子法：《文王世子》，一篇。

（十）子法：《内则》，一篇。

(十一)乐记:《乐记》,一篇。

刘向的分类,试图提纲挈领地了解《礼记》,但囿于《礼记》的内容实在驳杂,分类不免未惬人意。后世学者亦不乏为《礼记》重作分类者,如元代吴澄《礼记纂言》略分为通礼、丧礼、祭礼、通论四大类,将刘向原来的分类都打散。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说,《礼记》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,内容所含颇复杂,今略析其重要类别。他将《礼记》与《大戴礼》统分为十类,分类颇与前人不同,我们在条目下略去其所列篇目:

(甲)记述某项礼节条文之专篇。

(乙)记述某项政令之专篇。

(丙)解释礼经之专篇。

(丁)专记孔子言论。

(戊)记孔门及时人杂事。

(己)制度之杂记。

(庚)制度礼节之专门的考证及杂考证。

(辛)通论礼义或学术。

(壬)杂记格言。

(癸)某项掌故之专记。

台湾学者高明《礼学新探·礼记概说》则将《礼记》分为三大类,各大类下再分项:

(一)通论

1. 通论礼义: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郊特牲》、《经解》、《哀公问》、《仲尼燕居》。

2. 通论与礼有关之学术思想:《孔子闲居》、《乐记》、《学记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坊记》、《表記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儒行》。

(二)通礼

1. 关于世俗生活规范:《曲礼》上下、《内则》、《少仪》、《深衣》、《玉藻》。

2. 关于国家政令制度:《月令》、《王制》、《文王世子》、《明堂位》。

(三) 专论

1. 丧礼

甲、逸礼正经:《奔丧》。

乙、论变礼:《檀弓》上下、《曾子问》。

丙、记丧制:《丧大记》、《丧服小记》、《杂记》上下、《服问》。

丁、论丧义:《大传》、《间传》、《问丧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丧服四制》。

2. 祭礼

甲、祭制:《祭法》。

乙、论祭义:《祭义》、《祭统》。

3. 冠礼:《冠义》。

4. 昏礼:《昏义》。

5. 乡饮酒礼:《乡饮酒义》。

6. 射礼:《射义》。

7. 燕礼:《燕义》。

8. 聘礼:《聘义》。

9. 投壶礼(含逸礼正经一篇):《投壶》。

学者的分类往往是见仁见智的,所持标准不同,类目自然就有别,像高明归为“专论”之“丧礼”类的《檀弓》、《曾子问》两篇,内容记丧礼的变礼,刘向则将前者归“通论”、后者归“丧礼”;吴澄并归为“丧礼”一类;梁启超将前者归“记孔门及时人杂事”、后者归“专记孔子言论”。高氏的分类,对于想初步掌握《礼记》驳杂内容的读者而言,应该是有些帮助的。

四 《礼记》的意义与价值

《仪礼》及其他古礼经,是研究古代礼制的重要文献,由于经文内容多是礼节仪式,即使熟读经文,了解了礼节程序,但对于各种仪节背后

的用意，却仍然难以知晓，而《礼记》就保存了部分阐释礼经意涵的篇章，虽不全面，但正可指引后人阅读礼经的思考方向，补足了上述的缺憾。今本《礼记》的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等篇，是阐释《仪礼》中相应的专礼。而与丧服有关的《丧服小记》、《问丧》、《间传》等篇，则是补记《仪礼》的《丧服》、《士丧礼》等篇的不足。除了阐释古礼经义之外，《礼记》也对《仪礼》十七篇所未载的古礼颇有补充，例如《曾子问》记种种丧制、丧服的变例，即可补《仪礼》之未备。由于《礼记》是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，因此，后人亦可通过《礼记》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。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就说：

《礼记》之最大价值，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——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。盖孔氏之学，在此期间始确立，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。其蜕变之迹与其几，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。

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，则除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外，最要者实为两《礼记》。而《礼记》方面较多，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。

这是十分正确的看法。透过《礼记》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小至修身、大至治国的种种思想。以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为例，儒家政治思想中最有名的理想社会——大同与小康：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

《礼运》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理想国图景：最上乘的大同社会，大道盛行，人性本善，亲亲爱人，各安其所，君主垂拱而天下治。到了“大道既隐，

天下为家”的时代，“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”，虽然略逊一筹，却也算“小康”，尚属基本安定的社会。而其最重要的支撑便是礼义，礼义并不是强制执行的律法，礼义是依循天地万物的常情而形成的规范，因此得以收潜移默化之功，建立普世可行的价值观念，产生维系人心的力量。又如教育思想。我们从《论语》里可以看到孔子与学生之间的互动，可以勾勒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概貌，而通过《学记》，我们看到的是完整地体现儒家教育理念的专论。《学记》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及方法，至今仍对学校教育，乃至所有广义的“教育者”与“学习者”都具有指导意义。以教学方法为例，《学记》提出“豫”、“时”、“逊”、“摩”四种理论：“豫”是预防，意指在过失发生前先加预防，一如现代学校要订定共同生活常规，导引学生品行，使学生懂得为与不为的分寸，这便是“豫”的观念；“时”是适时，意指在适当时机教育学生合宜的知识，可说是结合孔子“因材施教”与兵家“因势利导”的观念；“逊”是渐进，指循序渐进地施教，就像现代各级学校选编教材莫不由浅至深、由简及繁、由具体而抽象，以配合学生逐步成长的理解能力；“摩”是观摩，意指互相观摩学习，其中含藏着孔子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，也是现代学校教育甚至社会各行各业善用的方法。《学记》的意义，不只是后人研究儒家教育观的学术资料，两千多年来，它一直为历来无数“教者”、“学者”指引方向，韩愈写出有名的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，岂能不受《学记》启发！现代校园有所谓的观摩教学、鼓励各级教师应该多多进修等，其理念源头焉能与《学记》以至孔子无关！

以一条人际关系原则为例，《曲礼上》说“贤者狎而敬之，畏而爱之”，与有贤德的人交往，要“狎而敬”、“畏而爱”，这是很中肯的。“狎”是指亲近贤者，这样就可以见贤思齐。既要亲近又要“敬”，人往往因亲近而生侮慢，慢心一生，便容易发生问题。后半句“畏而爱之”相反相成，畏不是恐惧，而是敬畏，带着敬畏又不失爱慕之心，人与人之间才能维持和平久长的关系。又如《少仪》说“不窥密”，即不窥探别人的私密。

今天常讲保护个人的隐私权,而各类大众传播媒体上却总是流言满天飞,狗仔队大行其道,因此这古老的道德规范至今并不过时。像这类提供个人修身养性的参考原则,《礼记》俯拾即是。研读《礼记》,不只让我们了解古代儒家的思想,更可鉴古知今,为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《礼记》中有许多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闪亮的思想,只要列举几句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录就足以说明问题:

道德仁义,非礼不成;教训正俗,非礼不备;分争辨讼,非礼不决。

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。

礼尚往来,往而不来,非礼也;来而不往,亦非礼也。

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道。

师严然后道尊,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

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。

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

小人溺于水,君子溺于口,大人溺于民。

生则不可夺志,死则不可夺名。

天下内和而家理……外和而国治。

苟利国家,不求富贵。

富贵而知好礼,则不骄不淫;贫贱而知好礼,则志不慑。

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。

……

至于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,自唐代韩愈引用之后,宋代理学家程颐、程颢高度重视,朱熹更重新编次,重新阐释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纂于《四书集注》中,成为理学家最重要的纲领性著作。元代起,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、士子求取功名的考试书。其在文化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。

毋庸讳言,《礼记》中也有不少封建糟粕,如等级制度,男尊女卑,以及最为诟病的“繁文缛节”。如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,尽可抛开那些“不

合时宜”的礼节与观念,而学习那些至今仍有价值的、应当遵循的礼仪与思想。

《礼记》的今注今译,已有许多学者做过工作,硕果累累。如王梦鸥的《礼记今注今译》(台湾商务印书馆),杨天宇的《礼记译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),姜义华的《新译礼记读本》(台湾三民书局),吕友仁、吕咏梅的《礼记全译》(贵州人民出版社),王文锦的《礼记译解》(中华书局),钱玄、钱兴奇等的《礼记》(岳麓书社),潜苗金的《礼记译注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)等等。这些译注大作,我们也拜读过若干,我们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杨天宇,他研究礼学,成绩斐然。他也是我北大中文系本科时的学弟。我接手《礼记译注》工作后,还准备拜访他,讨论各种今注今译本的成败得失。可惜的是,他竟不幸早逝,令人扼腕叹息。

我们有幸参加中华书局的“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”的工作,《礼记译注》的工作是纳入该丛书的。2007年,我曾与台湾暨南大学陈美兰副教授合作,为“中华经典藏书”项目编写过《礼记·孝经》选本译注。囿于编选时字数的限制,我们选录了《礼记》的部分篇章,有的是全篇如《曲礼》上、《学记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经解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;有的是部分选,如《曲礼》下、《王制》、《礼运》、《乐记》、《祭义》,此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肯定,先后印刷总数达十多万册。现在的全注全译本,由于陈美兰女士教学科研工作太忙而不能参加,让我感到非常遗憾,也非常紧张。幸而,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红林教授推荐了他的学生张萌来帮助我。张萌,是一位专业上很强的同学。她集中精力花了一年的时间,完成了初稿。本书的完成,首先要感谢张萌卓有成效的工作。自2013年末起,我在张萌工作的基础上,字斟句酌地将全部译注稿又打磨了几遍,直到2016年末,历时三年终于完成通稿。

记得最初接触《礼记》,还是1963年大二上“校勘学”课时,王重民教授和侯忠义老师带我们在善本阅览室,调出线装书,要我们将“大戴